

罗尔纲全集

第十一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罗尔纲全集

第十一卷

太平天国史类

(11)

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

李秀成传

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太平天国史类（11）

忠王自传原稿
考证与论考据

题 记

《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三篇，一、《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三、《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

说 明

这一部论文集共收论文三篇：一、《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三、《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第一篇论文是从太平天国史考证的实践工作中，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第二、第三两篇论文是对《忠王自传原稿》的考证，所以把它们编成一个集子就叫做《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

关于考据在历史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今天史学界还没有得到一致看法的大问题。新旧考据究竟有怎样的不同，考据用的是什么方法，做考据如何去发现问题，又如何去解决问题，考据的对象是什么等等，很少有人论及。这应该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不揣浅陋，谨把我个人研究太平天国史考据的经历，写成这一篇《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以向同志们请教。

自从去年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后，学术界呈现了空前的活跃。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方面，对《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也展开了争论。这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说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经过这一次争论之后，大家作深入的彻底的研究，预卜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结论。因此，我也不揣浅陋，写成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这两篇论文，以向同志们请教。

1957年6月12日罗尔纲谨志于北京

目 录

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新旧考据的不同	9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	40
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 ——《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	90

从太平天国史的考证体会到 新旧考据的不同

一 引言

新考据是与旧考据不同的。必须明确认识了新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然后才能够认识清楚新考据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与地位，也才有利于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

关于考据的作用与地位，今天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其中有一种，虽然还没有成为定论，但却得到了多数人同意，它包括两方面。

第一，把乾嘉学派的考据过高估价了。他们虽然指出乾嘉学派考据方法不能探求本质与规律的局限性，但却认为它可以完全担任鉴定史料、诠释史料、考证史事等显示史事的真实现象的任务。

第二，不加区别地把今昔的考证方法都认为只限于使用形式逻辑。

其实，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在它所使用的形式逻辑所能为力的小范围内，是会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书，不出名物训诂校勘等的范围，大都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他们谨严地运用这一个方法，因此就能够做得比较谨严、比较正确的结果。但一超出这个界限，这种旧考据方法就无能解决。

至于乾嘉学派旧考据所用的方法，和今天新考据所用的方法二者是不同的：乾嘉学派旧考据用的只是形式逻辑，在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指导之下进行考据；而今天新考据以辩证逻辑居于领导地位，形式逻辑只作为技术性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之下进行考据。二者所用方法的

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所决定的。说得明白些，是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为了要说明乾嘉学派旧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今天新考据方法跟它有何不同，首先要在下节把我从太平天国史考证的实践中得来的体会提出来说说。

二 从今昔工作的对照中看出新旧考据方法的不同

我在解放前做的太平天国史考据工作，长期受了乾嘉学派旧考据方法的局限和深重的束缚。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一段话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说道：

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程度要看研究对象的性质而定）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了；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相互的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①

这段话正好用来说明乾嘉学派旧考据方法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旧考据方法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用“人的常识”可以处理的范围中，也就是说初等的形式逻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吴黎平译本二十页。

辑的思维方法可以运用的范围中，再加上研究者的详细占有材料和谨慎的工作，那是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的。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某一历史现象是可以被视为已经形成的相对地分离的、稳固的和确定的史实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这里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是可以合用的。但这种方法“迟早地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一超过那一个界限，那时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中”。所以运用旧考据方法只能解决一些简单的寻常关系的事项，例如一部史料的辨伪，如《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考伪、《太平天国战纪》的考伪等；一件文物的辨伪，如《太平天国货币辨伪》、《石达开假诗考》等；一部书的校勘，如《天条书》版本的校勘、《资政新篇》版本的校勘等；历日的对照，如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的问题等等。如果问题的关系比较错综复杂时就没有解决的能力了。旧考据方法通常用的都是举例为证的列举式的归纳法，不仅这种列举式的归纳法如此，即使是有原则地选取归纳材料的科学的严格的归纳法，它所能达到的成就和辩证法相比较，也还是不完备的。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经指出：“用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不完备的。”可见要研究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复杂的科学知识，旧考据所用的初等的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是无能为力的，而必须进一步应用高级的逻辑——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

我通过六年来重写和新写太平天国史考据论文，我体会到新旧考据方法的不同，我检查出了旧考据方法的片面性、局限性，认识到新考据方法的全面性、正确性；我看出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破产，认识到唯物辩证法的优越。兹分述于下。

（甲）旧考据方法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

旧考据方法本身既有片面性、局限性，它又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指导之下做考据，就只能够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不可能得到历史的真实，甚至导引到错误的结论去。

例如我在1937年1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里，曾经指出太平天国是“贫农革命”（九八页），太平天国代表贫农，曾国藩代表

地主，这次革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六七页）。我这一个看法，原则上还没有错误。到1944年我用旧考据方法进行《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个专题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探求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可是，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个别的事物，而看不见它们的互相联系；我所看见的只是一大串纷乱的因素，而抓不住那一个作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来做研究的中心环节，从而舍本逐末，迷失方向，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罗列为：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黷废、民族思想与会党六个因素，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分散力量去注意各种支离破碎的孤立的问题。结果，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却一直向着各种支离破碎的问题去钻牛角尖：从人口压迫追溯到明代番薯、玉蜀黍的输入及清代乾隆后的传播；从长江水灾追溯到长江水患的起源；从鸦片战争追溯到鸦片的输入与对资本主义国家诬蔑吸食鸦片始自中国人的订谬。这样，就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原因的目的离题十万八千里！当时我在前社会研究所工作，写成这本稿子，送给所长陶孟和先生看。他看了说：“可惜化费了这样大力，得来的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自己也十分迷惘，自叹无能。一直到今天检查，才知道原来是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我的局限，给我的束缚。

又如我在二十年前就曾经考证过《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反封建的纲领，包括有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废除私有财产的圣库制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工业归国营的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还有人民选举乡官的民主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而其中则贯串着一个反封建的纲领。如果把这些内容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就看不出它的内部的联系，也就看不清这一个贯串其中的反封建的纲领。我那时候，在旧考据方法的局限之下去从事考据，正是这样错误地把其中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割裂开去一个个地单独地去做考据。因此，我所能考得出来的当然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史实，而无从看得出它们正是从一个纲领出发的一系列的政纲、政策，因而就不可能在这一个作为太平天国革命最主要的纲领考证里面，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提得出是一个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科学说明出来。

旧考据方法不仅在研究大问题上有着那样的局限性，就是以考证一个人物的问题来说吧，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有无天德王洪大全这一个人物的考证，我用的力量不能说不专，时间不能说不久，但是，我从前考证这一个问题，完全不懂得应该从天地会的制度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代表全会势力的大领袖，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的时候领导集团里面并没有一个代表天地会势力的领袖参加，在洪大全被俘之后，太平天国也没有排斥天地会、拒绝天地会加入的事等方面去考察问题，而仅仅是从《洪大全供》的真伪一点上拼命去钻牛角尖，1935年第一次写《洪大全考》时是这样，到1946年重写《天德王洪大全考》时也是这样，所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直到1954年我第三次写《洪大全考》时，我初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了，才检查得出过去在考证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因而才把问题解决了。从我过去所做的洪大全考证上，也具体地说明了旧考据方法所给我的局限，使我只懂得片面去钻牛角尖，而不懂得全面地去看问题。

由此可见，旧考据方法只能个别地、孤立地看问题，而不可能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所以不可能解决具有复杂错综性的历史考据问题，就是那些牵涉范围较广的历史考据问题也难于得到解决。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担负起这种任务。

（乙）旧考据方法是从现象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

旧考据方法是从现象看问题，所以只能够考出浮在表面的历史现象，只有新考据方法才从本质去看问题，探求得出史事的真相。试举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绘人物这一个问题为考据为例。

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问题，自从1952年南京堂子街发现太平天国壁画考出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这一件史实之后，观众就提出：“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绘人物呢”这一个问题来。最初我们以为：中国以前的人物壁画，是给佛、道宗教和封建礼教做宣传，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太平天国的壁画却是专为宫室建筑物的美观装饰服务的，故不准绘人物，而专取宜于做装饰性的山水花鸟之类的自然景物作为画题。这一个看法，我们不久看出是陷于形而上学孤立的、割裂的看问题的错误，把它放弃了。后来，我们从《旧约》进行

考据，考出《旧约》禁止绘人物，得出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是遵守《旧约》的禁条，是为了尊崇上帝。但是，《旧约》不但不准制作神像和人像，也不准制作“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形象；《旧约》不但反对壁绘人像，也同样反对壁绘“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而太平天国只根据《旧约》不准绘人物，然而却大绘特绘飞禽走兽，并没有完全遵守《旧约》的禁条。这就可见太平天国虽然抬出了《旧约》的上帝，但它只利用了这一个上帝对它有利的方面，而对它的革命斗争没有好处的方面却毫不理会。这就可见太平天国利用《旧约》不准绘人物的宗教信仰，只是现象形态，而不是事物本质。所以这一个“为了尊崇上帝”的看法，仍然是受了旧考据方法从现象看问题的局限。于是我们突破了这一个束缚，以新考据方法从本质看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得出了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目的是为了革命的斗争。它并不是什么宗教的信仰，而是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反封建作用。它是在思想战线上经常地（不分早期、晚期）普遍地（不分中央、地方）使用的对外打击敌人对内集权的武器之一这一个结论。

我们从太平天国为什么不准绘人物这个问题的考据，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旧考据方法只能够从现象看问题，考得出浮在表面的现象形态，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本质看问题，探求得出掩蔽在现象后面的历史真相。

（丙）旧考据方法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

历史事实往往是复杂错综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矛盾存在的。由于旧考据方法是用形而上学的“是则是，否则否”地去看问题，所以不可能解决此种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之下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探寻得出史事的真象。试举浙江绍兴太平天国壁画的考据为例。

绍兴市内现在相传有二十多处太平天国绘的壁画。这些壁画，绘有龙、凤、狮、象、虎，还绘有神怪故事。龙、凤等壁画，十分残破，但神怪故事壁画却保存得还完整。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根据许多方面已经肯定的事实，肯定了龙、凤、狮、象、虎等壁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而对那些存在着种种疑问的人物神怪壁画，则提出了是由于绍兴地主阶级诬蔑太平天国用人血绘壁画，诬蔑太平天国在房子里杀人埋死尸，所以在太平天国退出绍兴

后，有些地主阶级的家，便在太平天国绘过壁画的墙壁上，另绘上与太平天国信仰对立的東西而为他们所崇奉并且认为可以“辟邪”的神佛人物故事来加以“厌胜”。因为这些壁画，是当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就在太平天国绘过的壁上绘的，所以一代代传下来便误传是太平天国的壁画这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我们处理这个复杂、矛盾的问题，是把真的肯定它是真的，把假的提出它是假的，而假之所以作真，是由于假的是在真的位置之上绘的，所以才把假的误传为真的。这是必须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才看得出来的。可是，我在1953年初研究这问题的时候，还受着旧考据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束缚，我那时候看来，认为这些壁画应该全部否定的，完全看不出假中有真，假的还是从真的遗迹上重绘误传下来的这一个事实。后来经过一年多长的时间，极力地打破旧考据方法的束缚，不断地思考，才在复杂、矛盾的问题之中，逐渐地看得出来。

我考证绍兴壁画的经历，说明了旧考据方法“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的方法的无能为力，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从矛盾对立之中探寻得出历史的真相。

（丁）旧考据方法是静止地看问题，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

旧考据方法静止地看问题，不可能了解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只有新考据方法才能够发展地看问题，探求得出史事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真相。

例如研究太平天国思想有两部主要的文献，一部是《太平诏书》，另一部是《天条书》。这两部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引用了不少儒家的话；另一种版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萧一山在1933年做《太平诏书》和《天条书跋》，凭他的主观臆断硬说太平天国原来是宗教性很浓厚的，“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后来曾国藩起湘军以名教奇变为号召对抗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积数年之经验，因社会之情形，不得不翻然变计”，就在这两部作为教育宣传的主要的文件上，多“增入中国典训名言”，“故为佐证”，付之重刻，以迁就人心。^①

① 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诏书跋》。